

# 知青部落

ZHONGGUO

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

主 编  
朱政惠 金光耀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朱政惠,金光耀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9

ISBN 7-5325-3917-2

I. 知... II. ①朱...②金... III.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史料—上海市—图集 IV. D65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6589 号

# 知青部落

——黄山脚下的 10,000 个上海人

主编

朱政惠 金光耀

责任编辑

秦志华

整体设计

樊琳

技术编辑

陈文彪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网址:WWW.guji.com.cn

E-mail:guji1@guji.com.cn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经 销  
刷 次  
版 次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有限公司  
2004 年 9 月上海第 1 版  
2004 年 9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开 本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889×1194 毫米 1/20 15 印张  
1-7,000 册  
ISBN 7-5325-3917-2/K·654  
39.8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 知青部落

——黄山脚下的 10,000 个上海人

主 编：朱政惠 金光耀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丁 法 | 王小妹 | 王小鹰 | 王俊宠 |
| 吕银华 | 刘仲宇 | 朱政惠 | 朱菊英 |
| 李锡九 | 陈大康 | 杨代藩 | 张晓敏 |
| 单耀晓 | 金光耀 | 林 锋 | 顾肖荣 |
| 徐兆福 | 曹景行 | 章德祥 | 樊 琳 |
| 蔡亚平 | 虞文德 |     |     |

## 目 录

### 序 / 5

姜义华

### 卷首语 / 14

### 黄山给了我们承受力 / 26

曹景行、蔡金莲

### 可怜无数山 / 30

王小鹰

### 最顽强的是人的生命力 / 36

杨代藩

### 我们和他们一起见证历史 / 40

李锡九、徐兆福

虞文德、王俊宠

### 第一章

#### 黄山——一本翻不完的大书 / 45

##### 第一节 比《徐霞客游记》更加遥远 / 46

##### 第二节 我们从这里起步 / 56

### 第二章

#### 20 世纪下半叶的大迁徙 / 65

##### 第一节 先行者的足迹 / 66

##### 第二节 一代学子命运大转折 / 80

### 第三章

#### 在贫瘠的年代开犁 / 87

##### 第一节 汗水·云雾·茶叶 / 88

##### 第二节 林子·果子 / 102

##### 第三节 梯田如绣 稻桶如磬 / 116

##### 第四节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 126

## 第四章

### “扛”一座发电站上高山 / 141

#### 第一节 书生盖房 / 142

#### 第二节 野山也亮起了电灯 / 148

#### 第三节 公路通车亦悲壮 / 154

## 第五章

### 我们这样过日子 / 167

#### 第一节 小伙穿“花”衣 姑娘着素衫 / 168

#### 第二节 吃肉那天像过节 / 174

#### 第三节 同一个屋檐下 / 182

#### 第四节 大路盘山 小径通“天” / 188

#### 第五节 “赤脚医生” / 196

#### 第六节 爱情燃烧的年龄 / 200

#### 第七节 巡逻在深山密林 / 206

## 第六章

### 跌宕起伏的心灵世界 / 215

#### 第一节 当战友在洪水中牺牲 / 216

#### 第二节 大运动里的小群落 / 226

#### 第三节 曾经有过…… / 240

#### 第四节 不绝的文脉 / 246

## 第七章

### 收工之后“撒撒野” / 255

#### 第一节 心曲朝着空山唱 / 256

#### 第二节 坡上坡下球儿滚 / 268

#### 第三节 我们的闲暇时光 / 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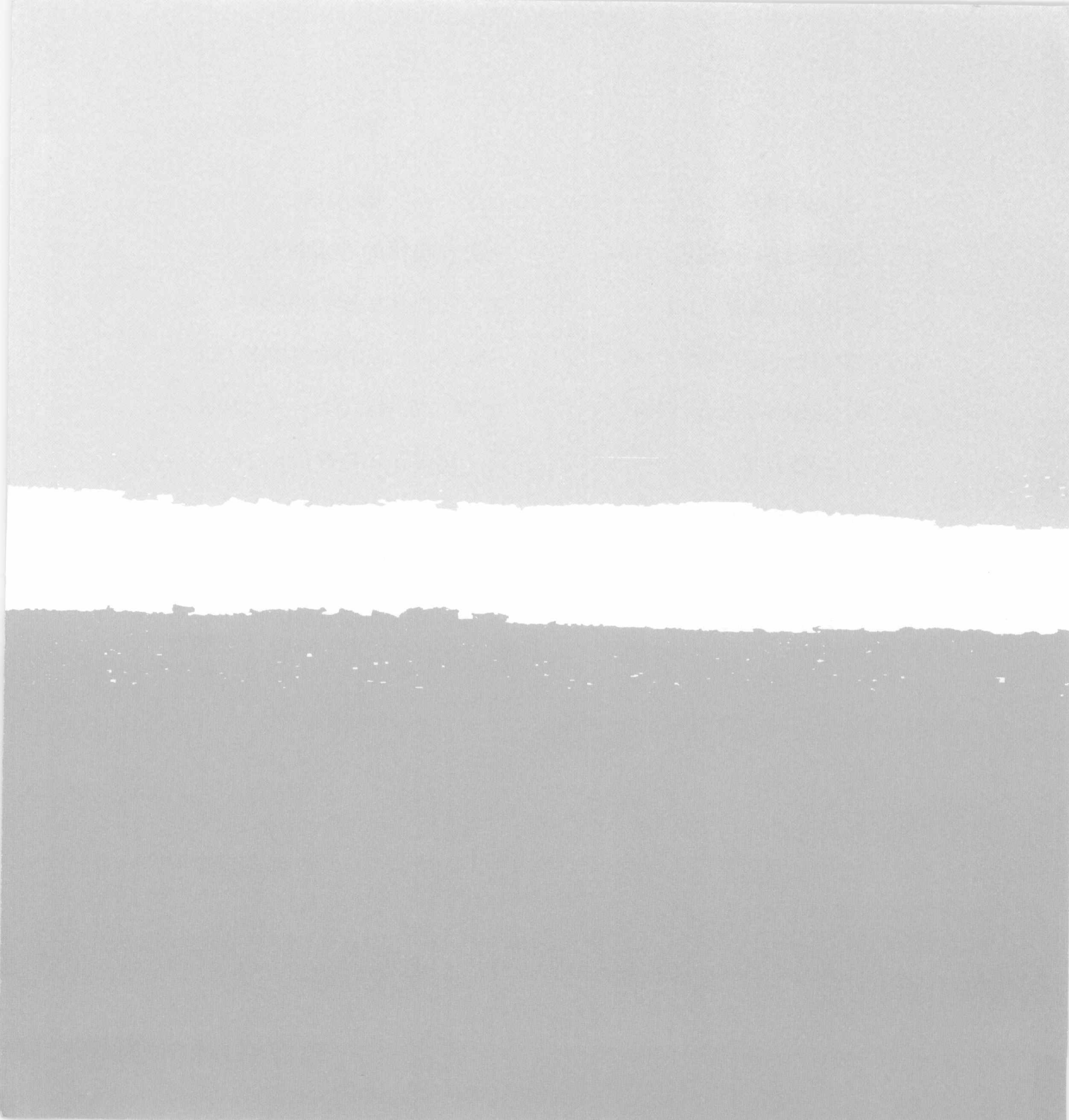
## 第八章

### 青春留在了那片山林 / 283

#### 第一节 别了，黄山 / 284

#### 第二节 回望 / 290

## 后记 / 295



# 序

姜义华<sup>[1]</sup>

“文化大革命”期间，总数达1700万的初中、高中以及大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落户农村，或者至农场、牧场、林场、渔场以及建设兵团，规模之大，举世所瞩目。这段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在“文革”史、现代中国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以及当代中国城市史、乡村史、青年运动史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成为近年来海内外中国研究中一个热门课题。《草原启示录》、《青春无悔》、《知青档案》、《中国知青部落》、《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知青备忘录》等众多著作，从不同角度描述和评价了这段历史。海外就此也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与专著。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新的著作，从当事人4,000余帧照片中进行精选，配以文字，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以图文相映的新颖表现

[1] 姜义华，上海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中国知青史纪年

### 1955年

8月9日，杨华等5名北京青年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在黑龙江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

9月，河南省许昌地委写的《郟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道了这个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0月20日，98名上海青年组成的“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来到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安家落户。11月29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专程赶来看望，并写下“共青社”三个大字。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





方式,集中再现了上海知青当时在黄山茶林场劳动、学习、生活的状况,虽然只是个案,却为中国知青史留下了一份极为真实的形象与生动的剪影。

1700万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合法性根据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一则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则指示,将城市中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统称作“知识青年”;他们到农村去的主要目的,被确定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根据这一指示,全国上上下下全面动员,除去充分利用宣传系统,还广泛利用单位、学校、街道、邻里、家庭等各种组织系统,造成了上山下乡光荣、不上山下乡可耻,以及除上山下乡这一条道路外,再无其他道路可以自由选择的形式。

论者常常过分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是为了安置无法升学及在城市就业的青年学生。但是,“文革”十年中,城市企事业单位从农村招收进城的农民就有1300万人。就毛泽东本意而言,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恐怕确实不只是从经济上着眼,而是主要从政治上考虑。让他们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被当时报刊诠释为“实现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这一指示,因而被称作“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战斗号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这时要强调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泽东这一指示,一是表现了对于在校大学、高中、初中学生的失望或不满意,二是表现了对于

贫下中农的高度期待。

在“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时候，广大青年学生充当了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他们得到毛泽东的热烈支持。毛泽东当时还特别指示，不准组织工农反学生，要求劝阻工农不要干预学生。<sup>[1]</sup>1966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评论员的《红卫兵赞》，热烈称赞红卫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建了不朽的功勋”，“他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扫着几千年来堆积起来的垃圾脏物”，是“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新生事物”。然而，到1968年夏，毛泽东对红卫兵已深感失望。这年7月28日，从凌晨3时半到8时半，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同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了整整五个小时，严厉批评他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告诫他们“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并警告他们：“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sup>[2]</sup>7月27日，他已派遣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制止武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

- [1] 毛泽东：《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示》，1966年9月7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4页。
- [2]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56页。

## 1956年

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下乡上山”概念的首次提出。



## 1957年

春，刘少奇在视察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和山东等省时，鼓励中小学毕业生做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刘少奇讲话的主要内容作为《人民日报》社论于4月8日登出。12月23日，周恩来总理为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题词：“庆祝上海的四千五百个青年学生下乡上山，参加农林业生产。”

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知，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学。在修改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时，他将题目改成《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特别加写了一段话：“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sup>[1]</sup>但是，问题并未就此解决。原先希望在“文化大革命”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批判资产阶级”的大风大浪中将“知识青年”造就成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队伍，现在完全失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回到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派出工人和军队的宣传队进驻学校，还不能使广大青年学生真正实现与工农的结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提出的。

毛泽东真诚地相信，经由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将可较为有效地将他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96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中说：“广大的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热爱毛主席、热爱党，有丰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经验。他们是知识青年的好老师。知识青年要学习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深厚感情，爱憎分

明的阶级立场，热爱社会主义的高贵品质，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这大体上概括了“再教育”的主要内容。

米高扬1949年1月与毛泽东秘密会谈之后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中，重点强调了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特别高的评价。毛泽东直言不讳地对米高扬说：“中国农民要比所有的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觉悟高得多。”“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无人可望其项背。……城市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城市里，如果说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那么在工人阶级中，国民党的势力要比共产党大。例如，在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共产党还处于公开状态时，上海的50万工人中，共产党的影响所及只不过有20万，其他工人都拥护国民党。”<sup>[2]</sup>这里所说的虽然是40年代后期的情况，但是，对于中国农民，尤其是广大贫下中农的信赖之情是极为鲜明的。在农业合作化进程和人民公社化进程中，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一再赞扬广大贫下中农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反复要求坚定不移地依靠贫下中农，都说明毛泽东寄希望于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完全不是偶然的或权宜的决策。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发出以后，凭藉毛泽东当时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挟“文化大革命”将

[1]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1页。

[2] （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中）《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

一切言论行动都提升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政治威势，广大青年学生无不闻风而动。在随后的年代里，当“最高指示”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权威性已大大削弱时，严格的户籍制度、粮油副食品等计划供应制度、城镇企事业单位就业制度、升学制度等等的限制，使上山下乡成为青年学生无可奈何的唯一现实的选择。

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知识青年”来到农村，确实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与难得的锻炼，在人生历程中学到了在学校中、城市中难以学到的许多东西。但是，却并非为毛泽东所期望者。

首先，广大的“知识青年”真正直接而具体地见识了广大农村是多么贫困，多么落后。从贫下中农那里，他们与其说是学到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与本领，倒不如说是从贫下中农那里见到了他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关注、摆脱贫困状况的迫切要求。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指出：“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严重情况，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根据农民的要求，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sup>[1]</sup>全国土地改革运

[1]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六册，第327页。



### 1960年

9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介绍下乡女知青邢燕子事迹的长篇报道，引起各地青年热烈反响。一个多月内，上海等18个省市有600名知识青年学习邢燕子奔赴农村。



### 1961年

首批2500名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员。至1965年，共有64000余名上海知识青年赴新疆。

动，因此被确定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可是，当“知识青年”们来到农村时，虽然只过了二十年，土地却早已归国家与集体所有，许多农民仍然处于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的状态。笔者当时在农村，工宣队军宣队出面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他们说不了几句，便大谈三年“大呼隆”（指1958年后“大跃进”）时，如何吃不饱，生浮肿病，死人。他们渴求“包产到户”，对土地、生产及产品有一定的决定权、支配权，他们希望扩大一点自留地，开放一些自由市场，但这些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倾向”而遭批判。中国农村的真实情景，中国农民的真实要求，只有到农村中去，到农民中间去，和他们一道生产，一道生活，推心置腹，方才能够得到真实的了解。尽管当时大多数“知识青年”还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认识这些问题，大量的感性经验还是使他们不再从报刊和书本的宣传中去了解中国农村、中国国情，并逐渐对这类宣传产生了怀疑，进而动摇了对基于这类宣传而制定的各类方针、政策的迷信。

广大“知识青年”来到农村，投入最为平凡甚至相当原始的艰苦的体力劳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学到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技能。从未经受过的艰辛、苦痛磨炼了他们，使他们不再像往日那么娇气，变得能够吃苦耐劳，大大增强了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尤为可贵的是，生活实践使他们政治上迅速成长与成熟起来。大量活生生的事实，是最为严厉的老师，使他们对于“最高最新指示”，对于“文化大革命”以及先前崇拜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个偶像，一步步从极度理想化走到开始正视实际，从狂热与盲从走到清醒与独立思考。

“9·13”事件以后，随着林彪集团退出历史舞台，“文化大革命”的神圣光圈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打破。随后“批林批孔”、“评《水浒》”等等，已远不能像先前那样获得广大“知识青年”的由衷支持。而巨大的城乡差异，艰苦的农村生产与生活实践，则名副其实地成为一座大熔炉，使一批有志的“知识青年”不甘沉沦，不甘落后，真正体会到决定民族命运和祖国前途的关键，不在那些轰轰烈烈走马灯一样你来我往的所谓“政治大革命”，或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在踏踏实实地和广大民众一起，立足于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国情民情，不是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而是根据农民的真实要求，扎扎实实地发展生产，奋发进取，使农民自身内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根本改变农村的贫困与落后状态。

“知识青年”到农村，获得了许多非常宝贵的精



神财富，这些财富使他们毕生得益。但是，这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方才获得的。他们将自己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长时间处在文盲成群、文化落后单调的农村环境中，他们文化、教育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知识的、文化的、精神的长久饥渴，使他们的成长受到严重伤害。一些人锲而不舍地偷偷坚持自学，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恢复高等学校考试入学后，成为新一代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迅速脱颖而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但是，更多的人却丧失了就学与深造的机会。由此而出现的人才断层，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许多人初中刚毕业就不得不去“插队落户”，正值身体生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长时间营养不良，使他们的健康受到损伤，甚至落下许多原可避免的伤残病痛，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前往农村，还使他们的家庭增加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与物质负担。

中国农村并不缺乏劳动力。骤然安插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并要承担起对他们进行“再教育”的任务，尽管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很努力，但常常会力不从心。而一系列新产生的矛盾，必然使下乡“知识青年”处境更为困难。1970年5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的有关部门拟定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中便强调：既要下乡“知识青年”当作“再教育”的对象，又要把他们看作三大革命运动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就给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个新的定位，正面强调了农村的

## 1962 年

9月，上海近400名高中毕业生组成“上海青年农业建设队”，随后赴崇明岛参加农业生产。



当年上海市知青标兵朱菊英。

## 1964 年

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中央为此成立了“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

发展需要“知识青年”。报告中还特别关注下乡的女知青,规定:凡是强奸女青年的,都要依法严惩;对女青年进行逼婚、诱婚的,要坚决进行批判斗争。这一事实见之于中央批发的文件,可见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但是,尽管增加了这一新的定位,在当时农村实际体制下,“知识青年”的处境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他们的作用也无法有效地得到发挥。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一名小学教员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在农村插队的孩子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又没有一分劳动收入,生活很困难。而在这些知青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又盛行拉关系、走后门。这封信竟到达毛泽东手中。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sup>[1]</sup>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3年6、7月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

作会议,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议定了6条统筹解决下乡知青存在问题的办法,要求切实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在口粮、住房、医疗方面的实际困难,安置费要适当增加,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办法中特别规定:对于以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知识青年和强奸女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惩办,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举行公判,坚决杀掉。以后,在农村的“知识青年”状况有了改善,但是,深层次的矛盾仍未解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终究还是无法继续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人们首次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正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实状况及其实际后果。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其纪要中不得不承认:全国17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安置人数过多的地方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为此,会议要求调整政策,城市中学毕业生留城安置比例要逐步扩大,有条件者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同时,要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到城镇企事业单位就业问题。尽管当时有关部门一再要求刹住下乡“知识青年”的“回城风”,但是,他们还

[1]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信》,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49页。



是不可阻挡地纷纷从农村返回城市，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具有浓厚政治意义的社会运动终告结束。

本书“卷首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在世界历史上也属罕见。这样一段历史，对于知青个人是珍贵的记忆，对于国家和民族，也是一段难忘的历史。”确实，这是一段非常特别的历史，值得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它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可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发出，至今已整整35年了。而作为其总背景的“文化大革命”，从酝酿到发动，至今已经快40年了。可是，中国人民付出了极为高昂而巨大代价的这段历史，至今尚未真正进入客观的科学研究阶段。太多现实的特殊利益，阻碍着人们实事求是地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恢复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但是，这终究无助于我们从那段历史中得到应该得到的最为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历史已经发生了，唯有正视它，方才能真正超越这段历史。笼统地感伤、赞扬，或者径直采取不承认主义，绝对不能使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上升到自觉状态。黄山茶林场当年的“知识青年”们是历史的有心人，他们珍视这段历史，珍视这段历史留下的丰富遗产。由朱政惠、金光耀主编的这部著作，弥可珍贵之处亦正在此。作为一名读者，我衷心地感谢他们。盼望有更多类似的著述出现。



## 1965 年

10月，“上海青年农业建设队”三队两千余名知识青年赴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



## 1966 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下乡知青成立各种群众组织，许多知青喊出“回城闹革命”的口号，出现了“返城风”。

## 卷首语

本书选刊的，是我们上海黄山茶林场知青的老照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在世界史上也属罕见。这样一段历史，对于知青个人是珍贵的记忆，对于国家和民族，也是一段难忘的历史。我们希图通过这组照片，保存这段不应忘却的史实。

对历史的客观考察，往往需在尘埃落定之后。对知青的上山下乡做评价，由我们的后人做更合适。但为理解这组照片，作为当事者的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将相关的背景以及我们所做的工作做简略的说明。

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可追溯到上一世纪50年代中期。1955年9月初，在共青团中央号召下，由60名自愿报名的北京青年组成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京庄”，开创了城市青年成批到边疆与农村的先例。当时的共青团中央第一

书记胡耀邦曾热情称赞这支垦荒队“是光荣的第一队，是中国青年的一个有意义的创举”。随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其中，上海98名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于10月赴江西德安县，胡耀邦为他们书写了“共青团”三个大字予以鼓励。

也是在1955年的9月初，河南省报道郑县大李庄乡有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担任了合作社急需的会计和记工员，毛泽东在将这篇报道收入他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表现出对青年学生以知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殷切期望。

###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 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

【新华社十七日讯】中共中央、国务院六月十三日发出通知，为了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且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通知全文如下：

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和高中，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这样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办法。

上一世纪60年代初前后因国民经济困难，国家大规模裁减企业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在城市就业变得十分困难。国家大规模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62~1966年，全国有12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来到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日趋扩大后，国家也设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1964年1月，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成立，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任组长。

当时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有解决城市中严峻的就业问题、开辟青年就业新途径的经济动因，但同时也包含着期待知识青年带动农村社会变革的政治考虑。进入60年代后，尽管就业压力仍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但在日益强调“反修防修”的政治氛围下，宣传上逐渐凸显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视之为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措施、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长期方针、缩小三大差别的战略决策，而其最初的、内在的经济动因反倒隐退了。

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中，上山下乡运动兴起高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所有正常工作包括升学、毕业等都已停止。此时，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央领导试图整顿并重建恢复新的社会秩序，但城市中却有从1966年到1968年积压了三届的数百万高中、初中毕业生。为了使这些学生尽快从学校毕业，党和政府提出他们的毕业分配工作应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而实际的重点在农村与边疆。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当时最流行的做法，发表毛泽东于12月21日所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



## 1967年

1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时说：“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你们应和农民一起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农村中为农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你们的困难，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找你们的代表座谈，帮助你们解决。”